

中日文化与交流

1



中日文化与交流

第一辑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室

《中日文化与交流》 编辑部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三月

主 编

杨正光

副主编

陈应年 严绍璗

中日文化与交流 (第一辑)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室
《中日文化与交流》编辑部

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市朝阳区展望印刷厂印刷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75

227千字 1984年3月 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1—3,000册

统一书号：7271·015 定价：1.15元

赠日本友人

一九五〇初

同气连枝世莫班，
好凭文物话因缘。
玉篇原帙存唐写①，
金泽群书拥宋刊②。
历劫遗珍求海国，
抗流高义重人寰③。
春风拂遍东西岸，
烂漫樱花两地欢。

① 玉篇为我国著名字书，梁顾野王编，唐宋屡经重修。闻唐写本传于日本。

② 日本金泽文库藏有宋版书颇富。

③ 鲁迅赠日本友人诗，有“斗士诚坚共抗流”之句。

豪五徵色

寄富士高衣

帶水晨夕博

通潮。丁巳年夏頌

中日文化交流》叢刊卷之

一九三八年夏功

謹

印

书法家启功为《中日文化与交流》题词

编 者 的 话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海天相望的近邻。两国之间具有长达两千余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并有许多相同的文化背景。两个民族都是勤劳和智慧的。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曾从中国吸取了先进的文明。今天，它已经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始终不衰。我国人民对日本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近年来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过去一个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曾在两国人民之间制造了人为的障碍，使两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痛定思痛，殷忧启圣。中日两国人民只有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符合历史的进程。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既源于历史的遗传，更着重于明天的赓续。为了全面介绍两国的文化及友好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我们在各界人士的帮助和支持下，特别是在几十年来从事中日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的各位先生的赞助下，编辑出版了这本文集。

本书筹备时间短，缺点和不足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愿这朵奇葩在中日文化交流的百花园中吐透芬芳。

一九八三年九月

顾 问

赵朴初、赵安博、溥杰

梁容若、汪向荣、胡锡年

吴廷璆、周一良

目 录

笔谈中日文化与交流

- 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决定因素问题 吴廷璆(1)
一个建议 梁容若(4)
中日文化的异与同 周一良(7)
纪念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松本龟次郎先生 赵安博(11)
祝贺和希望 李连庆(14)
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化 刘振瀛(17)

☆ ☆ ☆ ☆ ☆ ☆

留日学生的两大贡献 (特约稿)

- (日本) 实藤惠秀(21)
中国近代化建设和留日学生(特约稿)
——兼论松本龟次郎的影响 汪向荣(28)

悼念廖承志、王晓云同志

- 廖公和中日友好 赵安博(44)
高大的形象，难忘的回忆
——沉痛悼念敬爱的廖承志同志 周斌(4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悼念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

前驻日公使王晓云同志 杨正光(51)

为了中日友好事业

——忆爸爸王晓云同志

..... 王路平、王永平、王京平(54)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对日本

飞鸟时期佛教艺术的影响 陈晖(51)

《竹取物语》与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关系

..... 严绍璗(80)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近代日本游记研究札记 王晓秋(92)

梁启超与日本政治小说在中国的

传播及评价 陈应年(110)

文廷式庚子日本之行 汪叔子(130)

文学与艺术

诗二首 溥杰(155)

梅 酒

——鲁迅与西村真琴的交往 郑万鹏(155)

小林一茶诗歌浅探 曾杰(161)

交 流 之 窗

- 中日文学交流的过去和现在 唐月梅(183)
鲁迅与中日版画交流 李平凡(193)
漫谈日本电影在中国 李正伦(198)

人 物 春 秋

- 饮水思源
——记为中日友好献身的松村谦三先生和他的后代 金苏城(203)
骆宾基和热爱他的日本朋友们 韩文敏(209)

中 日 文 化 交 流 史 话

- 汉字在日本的流传 杨正光(222)

日 本 小 知 识

- 日本的国旗 徐建新(227)
日本人的姓名 望 月(228)
日本歌舞伎的开创者阿国 程 海(229)

动 态

- 关于日本“锁国”问题的研究 管 宁(231)

发展中的北京中日文化

- 交流史研究会 伊园 (241)

友 好 城 市

- 北京和东京的友谊金桥 史美煌 (234)

- 中日两国缔结友好城市一览 (247)

文 献 资 料

解放后北京的第一个日本人团体

- 北京市日本人学习会 易木 (249)
稿 约 (263)
广告刊例 (265)

赵朴初题诗：赠日本友人

书法家启功题词

封面图片：周总理和松本龟次郎一家（邓家驹画，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



笔谈中日文化与交流

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决定因素问题

吴廷璆

《中日文化与交流》文集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我首先表示衷心的祝贺。文集的出版不仅为研究中日关系和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园地，而且在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关系方面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近，我应邀参加了日本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创立五周年纪念大会，还到了日本其他地方访问、讲演。日本学者对我国关于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很感兴趣，双方就一些学术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日学者在日本史研究上有许多共同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分歧。例如在日本史分期问题上，彼此就一直有不同看法。我国的学者中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见解也不尽相同，如对日本最早的国家——邪马台国的方位问题就存在大和说和九州说两种意见。大和说中，最近有一种学说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论证邪马台国应在古代日本生产力最发达的大和地区。日本也有人持这个观点。这一问题已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注意和评论。

我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魏志》成书年代同“古坟时代”的时间差距、遗物证佐(金印、铜铎、铜镜及其熔范)等方面辨析，特别从其生产关系上考虑，认为邪马台国应当在容易接受大陆文

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又很尖锐的九州地区。尽管当地的生产力不发达，一般还处在弥生时代后期的状况（具体意见另文说明），但早期国家的形成已具备充足的条件。

在日本古代史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直接决定历史发展和变革的例子，还可举出大化改新的史实。改新前日本社会生产力本不发达，由于奴隶主贵族压迫剥削奴隶、部民，从而引起“盗贼”蜂起。到了七世纪中叶，随着隋唐文物制度的传入，皇室贵族终于在一次政变中推翻了家长奴隶主统治，实行封建土地国有的班田制，确立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日本史学界虽重视当时生产关系，但认为班田制仍是奴隶制的继续，封建社会要到镰仓时代才开始。这和我们的观点完全不同。

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问题，日本学者认为维新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明治政权是封建末期的专制王权。这由于当时日本的生产力不发达，资产阶级不成熟，维新后封建势力仍大量存在诸原因。我们则认为，单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点不能说明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且很快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事实。十九世纪后半叶，东方封建国家日本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若不反帝、反封建，不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只有灭亡。因此，尽管当时日本生产力还较低，但在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特别在开港后，阶级斗争空前高涨，民族危机深重之时，终于被迫实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化的下层武士和豪农豪商结成讨幕派同盟，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积极倒幕，经过一年内战，推翻了封建领主统治，争得民族独立，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认为明治维新是一种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里，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直接决定日本国家民族的命运。由此揭开了亚洲国家新的一页。

我们肯定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并不否认社会变革中生产力是基础的看法。但生产力总是受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制约，它促进或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起着积极或消极作用。以我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五四”前后“醒狮派”曾指责共产主义在中国没有物质条件，而恽代英、蔡和森等同志指出，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榨下，生产确实落后。但是，劳动人民为了死里求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付出了重大的流血牺牲，终于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可见后进国家中，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不能不是决定变革成败的动因。

后进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遇到生产力水平的问题。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中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后实现工农业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他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9—691页）列宁这段话不仅揭示了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这次访问中，我深深感到，尽管我们与日本学者在学术观点上并不相同，但是通过两国学者的交往，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对于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增进友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 个 建 议

梁 容 若

文化交流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环，不但能促进彼此的进步，而且还是人民间友好的保证。长期以来，国际间都重视文化交流的工作，尤其是在交通发达，世界大通的今天，任何地区、国家都不能再闭关自守，独占智慧。二次大战后，国际局势虽变换无常，然文化交流却有增无已，其原因即在此。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隔至近；民间往来频繁，且历史悠久，可远溯到上古；文化交流，也源远流长，彼此浸润，互补短长。至今两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的痕迹可见，这就是明证。

中国文化甲于世界，影响几遍及地球每一角落；但长期来或因天灾，或以人祸，致文物典籍损毁者极夥，即仅存之文化遗产，在近二、三世纪以来，也因战祸、盗卖等种种原因，不少流失在外。其中有一部分即保存于日本。如正仓院、帝室博物馆、静嘉堂之收藏唐宋文物、东洋文库、宫内省书陵部、东京、京都两大学之收藏中国佚失孤本，都是世所共知的。这些罕见文物和孤善本典籍，都是研究当时中国历史、世界文明的有力根据。

日本虽因地理环境和极少大规模战乱等原因，文物的逸散较少，但在过去和中国频繁往来中，亦有部分已不见于本国，而尚存于他邦者。此次战争中，日本文物典籍受损亦非寡，如冲绳被夷平，记述琉球中世对外关系文献《历代宝案》原件，亦化为灰烬，所幸其全部照片尚存于中国。这样的例子还很多，由于两国文化上交往，历史久远，范围广泛，因此罕见文物典籍之为对方珍藏，自属情理之常。今天如能充分利用这些珍藏，不仅有益于

专业研究，即对世界之贡献，亦属匪鲜。

文化合作是一件好事，过去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曾有过先例，黎庶昌、杨守敬、张元济、冈千仞等都曾访书异邦，覆刻、景印，以补阙失。但他们的工作，都仅属个人行动，不惟力量有限，且在当时技术条件下，亦难尽善，因此所得甚微；政府间虽亦曾注意及此，但往往受政策影响，致收效不多。过去日本曾利用庚款而办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即其例证。虽然这样，文化合作之为两国有识之士所重视，却由此而得到说明。

现在情势有了很大变化，不但政治上情势有所开展，中日建交已整十年，两国间已在各领域，包括文化方面进行合作；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翻刻复制已臻于至善，使过去所难以办到的，今天可毫无困难地完成。日本曾仿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惟妙惟肖，然未损原物毫毛；美国国会图书馆缩照北京图书馆善本，并以其底片供应世界，不惟其效果远超昔日之覆刻、景印，且费用之廉，尤非过去能比。由此可知珍贵之文物典籍，已能在不必损人情况下，从事利己利人之复制，普遍地供全世界学术界所应用。

为此，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复制翻印珍贵之罕见文物典籍，使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一新阶段，进而加强、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友谊。翻印复制，当然需要费用和技术，我们认为，日本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这责任。

在中国，可以不斤斤计较于近一世纪以来，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可是在日本，却不能因中国之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而忽略其曾加于中国的灾难和祸害。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八年战争，中国战区中的文物典籍，除极个别地区外，几经破坏殆尽。怎样治疗这种创伤，应是日本道义上的责任，责无旁贷。何况七十年代日本曾以所藏明版善本九百余种，缩微复制后寄赠美国，并捐巨款发展日本文化。那么今天日本承担这笔费用，不惟用行动说明了其深刻反省的诚意，而且也为国际文

化合作开创了良好的先河。相信有远见的日本人士，是会考虑并赞助的；当然，具体的执行，将有待于两国专家们会商、研究，但有一点必须弄清，就是这是合作，不是施舍；过去失败的教训，应引为鉴。

我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之研究，垂四十余年，深感两国间的文化合作，是有深刻意义和广阔前途的；相信两国和我们从事同样研究的，亦必有此同感。

今天愿假此提出这一建议，供两国政府和文化学术界人士考虑，并翘首企望其成为事实。

